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五·四”想象¹

铃木将久

一 前言

改革开放初期即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思想解放”。其实“思想解放”原本与“五·四”有密切关联。周扬1979年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宣称:“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²在文章中,周扬把林彪、“四人帮”比作延安整风时期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呼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实践。不言而喻,这篇文章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周扬把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运动直接与“五·四”连接起来,显然有意推动思想运动,并赋予正当性。周扬有意链接“思想解放”与“五·四”,背景其实并不简单。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发展中,“思想解放”是政治运动,周扬的报告乃是政治行为。但即便如此,“思想解放”实际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即是,解放了诸多旧时代的观念,开拓新时代的思想。概而言之,“思想解放”并不是对70年代末期中国的客观描述,不管在政治意义上还是思想领域中,通过“思想解放”推动时代开创新局面。换言之,“思想解放”与其说是阐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表述,还不如说是启动新的思想运动的动词性话语。

今天重新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五·四”想象,不可避免地要思考“思想解放”。重要的是,“思想解放”的过程相当复杂,有很多曲折。梳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整个过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本文无法全面

1 本文根据2019年5月11日东京大学举办的《长时段及东亚历史视野中的“五·四”:百年纪念研讨会》上的报告修改而成。感谢主持会议的林少阳教授和讲评的宋声泉副教授。在这篇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承蒙宋声泉副教授的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2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改革开放初期周扬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但本文无法展开讨论。

展开这个重要工作，仅集中讨论其中一个环节：既然“思想解放”是动态性的思想活动，我们便不该把目光局限于几位著名思想家的言论，还可以扩大到更广泛的有名甚至无名的知识分子群体。

谈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大学生。大学生如何参与和深化“思想解放”运动，必定是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1977年恢复高考，转年复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正式入学，之后陆陆续续形成了新的大学生群体。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包括不同年龄、不同经验的学生，成分相当复杂，而且或多或少都在文革时期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从这种经验出发组织各种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具有复杂背景的大学生，都一致强烈追求新的知识，渴望产生新的思想，因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独特的知识场域，把“思想解放”付诸现实。一定程度上，当时的大学校园就是动态性启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带。鉴于此，本文关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思想活动，初步讨论他们想象“五·四”、进行“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以及展开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生的“思想解放”在运动中发生不少变化，他们在最初解放了自己的思想之后，会再三解放下去，形成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思想的动态运动。本文通过致力于理解大学生群体寻求“思想解放”的动态过程，试图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时期“五·四”想象的变化过程及其意义。

二 武汉大学的校园

为了解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活动，本文主要处理两个青年刊物：《这一代》和《青年论坛》。《这一代》于1979年11月创刊，由十三校学生文艺刊物联合创办，分别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杭州大学中文系《扬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创刊号由武汉大学《珞珈山》负责编辑。根据执行编辑高伐林的回忆：“最早提出创办全国性大学生文艺刊物的也是张桦，但一开始我们并没想到自己动手。我们只是认为，无论从这批文艺后备军的实

力而言，还是从表现新时期大学生风貌的需要来看，办这么一个刊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六月份，我们向联系较密切的十几所大学学生社团提出了联合自办刊物的建议。大部分社团同意“入伙”，商定暑假在北京协商。”³高伐林当时写了不少诗歌，并发表在刊物上，而且又是学生领袖，担任武汉大学文学期刊《珞珈山》的编辑组长，自然成为《这一代》的执行编辑。⁴张桦也是《珞珈山》的编辑之一，由于他老家在北京，负责与其他学校文艺社团的联系。⁵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大学都有文艺社团，他们活动相当热烈，而且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艺社团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从而以高伐林、张桦和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为中心，联合全国各地的文艺精英，出版全国性的文艺刊物，表现“新时期大学生风貌”。

这份杂志内容丰富，包括小说、诗歌、杂文和文艺评论。但可惜，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不仅如此，第一期也不全，在我手里的版本的封二有如下记载：“由于大家都能猜测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⁶现在留下的版本残缺第65页到第80页、第97页到末页。参与编辑工作的於可训回忆道：“当刊物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印刷厂印制的过程中，却有人指出其中的作品有政治问题，……于是《长江日报》的领导决定停印。虽几经交涉，终无结果。最后只好将一部分封面套过色一部分还没来得及套色，而且有的稿件也残缺不全的刊物拉回学校，在封二加写了一个油印的《告读者书》后，分送各地参与主办的学校自办发行。”⁷其实，与出版《这一代》几乎同时，北京出现

3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青年论坛》总12期，1986年9月，第64-65页。

4 参见李明华：《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粤海风》2013年第5期，第18页。李明华说，高伐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80年代就已誉满诗坛，是中国朦胧诗派的元老之一。”高伐林就读大学时代在《武汉文艺》《芳草》《长江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不少诗歌作品，可见他的才华获得广泛认可。但他与中国朦胧诗派有何种关系，还待研究。

5 参见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原写于1988年，后来发表在高伐林的博客上。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010/70607.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010/70719.html>。

6 《告读者书》，《这一代》第1期，1979年，封二。

7 於可训：《代序：混迹于一代人中间》，《新世纪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了西单民主墙，在这种时刻全国大学生联合办报，容易引起官方的警惕。但大学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敏感性，本能地发出声音，却遇到政治问题。

《青年论坛》1984年11月创刊，据封面记载，由武昌东湖路附50号的《青年论坛》编辑部出版，实际上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杂志。根据编辑李明华的回忆：“1984年初，胡德平来到湖北，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驻湖北特派员，兼驻湖北联络组副组长。有一次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有关改革的会议，我和王一鸣参加了。我们见到胡德平在会上，就以两个人名义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介绍我们的身份和准备办一家研究改革的青年理论刊物的设想，希望得到胡德平的支持。……宣传部会议两天之后，胡德平约我们到联络组下榻的东湖宾馆谈话，非常亲切地询问有关情况，表示支持我们的办刊设想。”⁸《青年论坛》的命运比《这一代》好一点，但也只有两年多的历史，共出版13期。据李明华讲，《青年论坛》1987年1月号（总第14期）已编辑好，但同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紧接着，上面来指示，宣布《青年论坛》‘停刊整顿’。”⁹

从内容来看，《青年论坛》与《这一代》不同，是明确指向改革的理论刊物，即是，不重视文艺创作，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尽管如此，仍可以看出这两份杂志之间的延续性。首先，这两份杂志都在武汉编辑，编辑人员有很多重叠，如高伐林等。李明华也讲到：“《青年论坛》编辑部的骨干，多数是珞珈山学子”¹⁰，大部分是武汉大学77级、78级的学生。更重要的是，这两份杂志都引起全国大学生的共鸣。高伐林写道：“十二月上旬，《这一代》在学生中发行了。当天就有了强烈的反响。那确乎可以称为‘浪潮’。许多人来函或从外省市专程找上门来要求买，刊物很快一售而空。”¹¹李明华也回忆道：“当时杂志影响之大，也超过一般人所想象。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其一，1986年杂志征订数近4万册，而当时各地方办的理论刊物，一般发

第7-8页。

8 李明华：《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第14页。

9 李明华：《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第19页。

10 李明华：《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第15页。

11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第73页。

行量只有 2000 至 3000 册，4 万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高校学生自费订阅。”¹² 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份都在武汉编辑出版的杂志，获得全国大学生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全国大学生的精神和思想状态。

以武汉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刊物之所以取得全国性的重要位置，固然有多方面的理由。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刘道玉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1977 年文革结束不久被任命为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根据刘道玉的回忆，文革后，“教育领域是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治理需要内行的人。”¹³ 他作为内行人，担负“艰巨”任务，如参加 1977 年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深入参与恢复高考的讨论。他 1979 年 4 月辞去教育部的官职，调回武汉大学，1981 年正式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调回武汉大学之后，为了重建武汉大学，做出多方面的改革。根据他自己的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而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 6 项教学制度的创新，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美誉。”¹⁴ 虽然 1979 年出版《这一代》时，刘道玉没有正式担任校长，但他积极支持学生的活动，而且后来刊物出了问题被迫停刊时，刘道玉出面保护学生。由此可见，武汉大学在刘道玉的领导下，在国内率先进行教学改革，在这种风气下，学生敢于挑战，表现出年轻人特有的思想活动。《这一代》和《青年论坛》则是他们活动的结晶，成为全国大学生的代表刊物。

下面，本文试图从《这一代》和《青年论坛》中挑选有关“五·四”和

12 李明华：《珞珈山——思想者的摇篮》，第 15 页。

13 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115-116 页。

14 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第 173 页。1983 年，改编自喻杉的同名小说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上映。该片以当时武汉大学的校园生活为素材，展示了五位个性鲜明的女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她们与校长“路石”自由对话的场景，尤为人所称道。影片中思想开明、作风民主、追求创新、锐意改革的“路石”校长的原型就是刘道玉。按小说原作者喻杉的设计，“路石”之名对应的正是“道玉”。影片放映后，在全国高校中引起了轰动，成为最受当时大学生欢迎的电影。从荧幕上可亲可敬的“路石”校长的形象，可以见出刘校长所博得的广大学生的好感和拥护。

“思想解放”的重要论述，加以分析。

三 大学生的时代感觉

《这一代》的态度，表现在作为创刊宣言的文章《写在创刊号的前面》：“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一代有了他们崭新的文学：真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通过艺术形象去追求真理，去唤起人们的信念、意志和尊严，歌唱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在艺术上决不屈服于任何‘最新制定的创作规格’，绝不停止对新的艺术风格、艺术方法的追求和探索。”¹⁵ 根据张桦的回忆，署名为十三校《这一代》创刊协商会全体代表的这篇文章，是由北京大学的黄子平和中山大学的苏炜执笔。¹⁶ 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史家兼文学批评家的黄子平，几乎同时参加《这一代》与《今天》两份杂志的工作，在当时早已是文坛上的活跃人士。他的文笔精准地表达了大学生的精神和思想。这篇文章首先不满于社会上对大学生的混乱认识，故而自我命名为“这一代”；然后宣布“这一代”要致力于自我表现，去探索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提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主张。

於可训执笔的《潜在的潮流》则是对大学生文艺活动的述评文章，清楚地表达了大学生表现自我的方向。他论述具体的文艺作品的同时，总结大学生文艺活动的重要性：“他们过早地经受了太多的痛苦，欢乐和磨难。因此，他们今天有权利、有义务，也抑制不住要向人们诉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他们今天正在经历着的现实以及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的将来。”¹⁷ 这篇文章表达了几个观点。第一，他认为大学生的文艺活动处于“潜在”状态，即意识到大学生文艺还没被认可；第二，同时指出，虽然是潜在但已有“潮流”，因此致力把“潜在的潮流”公开化，这就是《这一代》的目标——它显然与黄子平等写的创刊宣言相一致；第三，他将痛苦、欢乐和磨练相并列，强调同等地表现过去的苦难、现在的奋斗和将来的理想：这个态度隐含着对当时风靡文坛的“伤痕文学”的微妙不满，他没有否定“伤痕文学”，但同时认

15 《写在创刊号的前面》，《这一代》第1期，1979年。

16 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

17 於可训：《潜在的潮流》，《这一代》第1期，第82页。

为不该停留在伤痕，必须追求未来，探索新的艺术活动。他似乎主张“这一代”的特点不能局限于“伤痕”，而要具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也有推动未来的力量。¹⁸

在此意义上，《这一代》里最有理论含量的是一篇题为《变革现实的文学》的文艺评论。这篇文章虽然载于刊物的第73页，但在目录上被放在最前面，可见编者很重视它。文章署名为武大《珞珈山》评论员，但根据高伐林的回忆，是由王家新执笔的。

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王家新，也在《这一代》上发表过一首诗。他的诗歌《桥》写的是隔开中南海与北海的石桥，有这么几段：“桥南是中南海：岗哨游弋，楼阁隐约，/桥北是北海：笑语泛舟，春波戏荷……”；“多费解！沟通着两岸的桥呵、桥呵，/在这里却变为锁，一把生锈的大锁！”；“桥，是桥吗？不，这是一条国境线！/领袖与人民，被它隔开在两个邻国！”¹⁹这几段激怒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成为《这一代》不得不停刊的理由之一。但其实，王家新当然绝不简单地批评中南海的中央领导，这首诗的后面有这么几段：“桥、应该成为桥！成为一把强劲的大橹！/摇着中南海呵，驶往中国的每一条江河……”；“呵！那时，我的诗也将抹着热泪从桥上奔过，/它会放开音量喊呵——我来了！我是颂歌……”²⁰王家新作为愤怒的青年，一方面严厉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但另一方面渴望中南海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理想状态。再对照他在武汉大学时期写作的早期代表作《在山的那边》，王家新的理想主义更明显。这首诗反复描述山和海的意象，第一部分描写小时候越过山的愿望，第二部分描写山和海的对比，最后有这么一段：“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你终会走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瞬间照亮你的眼睛……”²¹容易看出来，王家新的山和海

18 张桦的回忆也表示这种精神：“稿源并不紧张，绝不像现在的杂志编辑们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锅，堆在宿舍里的油印杂志有一大堆，文笔好的比比皆是，可就都是“伤痕”味太浓，……尽管当时我们的境界并不甚高，可血泪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觉得不是滋味，还得考虑刊物的总体形象呢！”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

19 王家新：《桥》，《这一代》第1期，第46页。

20 王家新：《桥》，第48页。

21 王家新：《在山的那边》，《长江文艺》1981年第5期，第49页。这首诗后来有不少修改，本文引用首次出版的版本。

的意象，一方面表示对艰难现实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示对理想的憧憬。换言之，王家新的诗歌作品正如於可训的主张那样，作为“这一代”的文艺活动，同等地表现过去的痛苦和未来的希望。他发表在《这一代》的诗歌《桥》不例外，文艺评论《变革现实的文学》也不例外。

《变革现实的文学》署名为武大《珞珈山》评论员，文章观点当然不能等同于王家新个人的想法，但恰恰因此，突出显示当时武汉大学学生的集体意识。这篇文章一方面严厉批评旧时代的文学：“变革现实的文学又是肯定的，但又和那种满足现状、粉饰生活的‘瞒和骗’的文学绝不相同。我们之所以对现实持肯定态度，是因为我们坚信在现实中存在着新生的、光明的、先进的巨大力量，是因为这种力量必将通过现实的斗争去赢得未来。”²²“瞒和骗”的文学显然指着文革中风行的文学，用文章后面的话来讲，是“那些屈从于‘长官意志’，按照这种‘法定’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²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仅仅批判文革中的“瞒和骗”的文学，却没有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而提倡真正遵守社会主义的文艺方法。“我们坚信，只要是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创作灵魂，坚持对生活 and 艺术的独立思考，坚持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反转过来影响现实生活为自己的任务、敢于在艺术上创新的作家，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展开在他面前的，也将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²⁴容易看出来，这篇评论认为文革中的文学创作脱离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沦为“瞒和骗”的文学，从而主张恢复应有的社会主义文学方法，找回文学的正面功能。他显然否定过去的文学。但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认为遵守社会主义文学方法的创作才能“变革现实”。我们可以认为，这篇文章代表“这一代”的集体精神，否定过去的痛苦的同时，把目标定为开拓美好的未来，因此更加强调变革，而变革现实的文学创作方法居然遵循社会主义的文学精神。

可惜《变革现实的文学》的大部分篇幅，就是由于印刷单位的停印残缺的部分，我们无法看到。但高伐林后来补充部分内容，摘写这样一段：“我们必须继承鲁迅先生未竟的‘改造国民性’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22 武大《珞珈山》评论员：《变革现实的文学》，《这一代》第1期，第81页。

23 武大《珞珈山》评论员：《变革现实的文学》，第81页。

24 武大《珞珈山》评论员：《变革现实的文学》，第81页。

把五四以来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也必将更新……在思想专制的淫威下，我们民族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创造力所遭受的厄运！”²⁵这段话清楚表示，1979年大学生有意继承“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坚持“五·四”精神才能推动新的运动。这篇文章一方面痛斥文革中的文学生态，另一方面坚信从“五·四”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发展道路。在此前提下，他们试图变革现实，建立美好的未来图景。

其实，高伐林摘写这段话后，立刻指出1979年大学生的局限：“然而，你们手里没有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先进武器。虽然你们来自社会底层，在十年动乱中与人民共沉浮同忧乐，获得了大量生动印象、切身感受，你们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它们的内涵、洞悉它们的底蕴，无法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现阶段的历史特征、力量对比和现实任务、策略。”²⁶他充分认同1979年大学生的丰富经验，尤其在文革中的切身感受，但指出大学生停留在感受的层次上，没有深刻一层的思考，也没有提炼出理论，因此虽然愿意变革现实，但仅仅是愿意而已，实际上无法做到。高伐林指出1979年的局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写回忆时已参加重视理论建构的《青年论坛》杂志，不再表现文学性的激情，反而致力于理论探索。高伐林的反省表示着1979年和1984年的不同环境。换言之，我们通过高伐林的表述可以理解1979年大学生的时代感觉以及1980年代初期大学生精神状态的轨迹。

四 如何探索理论

《青年论坛》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泽厚寄来的《前辈寄语》，其次是署名韩小年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如果考虑到《青年论坛》每期开头刊载《前辈寄语》，表示对前辈学者的尊敬，实际上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则是《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有关作者“韩小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青年论坛》大部分文章末尾写明作者的年龄和工作单位。这篇放在创刊号开头的文章，却没有写明作者信息。由此考虑，很可能由编辑部的骨干，或经过编辑部的集体讨论而执笔的。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似乎是杂志的创刊宣言：

25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第70页。

26 高伐林：《一个前〈这一代〉编者与一个〈青年论坛〉记者的对话》，第71页。

“中国大地上空前的改革浪潮，正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同时也拍打着传统意识形态领域的堤岸。每一个志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理论工作者，都肩负着对我们过去所奉行的某些理论、对传统观念进行深入反思，对改革过程中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进行深入探讨的艰巨任务。”²⁷ 杂志的任务明确指定为通过反思过去的理论和传统观念，探索理论、推动改革。

《青年论坛》创刊号引起很大反响，《读书》杂志居然发表一篇书评文章。书评文章果然谈及《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署名‘韩小年’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主题》两文，体现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怀抱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这两篇文章力图鸟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鲜明地提出了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左’的流毒、发展商品经济、补历史应补之课的中心思想，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症结的根本一环，从而把握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²⁸ 其实《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的表述更谨慎，突出“经济改革”，避开“商品经济”一词，而且用了大量篇幅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之下，探寻能够推动改革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之下，《读书》上书评文章的表述更激进。但虽然如此，或恰恰因此，《读书》的书评文章清楚掌握《青年论坛》的方向。《青年论坛》反思过去的理论和传统观念，主要针对“左”倾教条主义，他们推动改革，主要意味着经济改革，即商品经济的发展。

《青年论坛》创刊号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胡德平的文章《为自由鸣炮》。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新华文摘》《长江日报》等报刊转载，影响到全国各地。《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与《为自由鸣炮》分别表现了《青年论坛》的两个主要目标，即经济改革和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为自由鸣炮》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关心自由，不只是从道义和情感出发，更不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自由作为纯粹精神的范畴。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自由的本质首先要从人类在自然界、人类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来看。自由始终是和劳动、人类的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的。自由是人类主体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自由程度始终不能

27 韩小年：《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青年论坛》总第1期，1984年11月，第5页。

28 甦民：《芳林新叶——评〈青年论坛〉》，《读书》1985年第11期，第29页。

超过对客观事物认识和改造的程度。”²⁹ 我们可以看出来，胡德平也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意义，从而论及自由化的需求。不管《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还是《为自由鸣炮》，1980年代初期青年的理论探索总是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然后针对文革时期的历史经验和当下中国的现实，建立新的理论话语。如果想起高伐林论述1979年的青年没有理论武器，那么1980年代的武器居然是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为自由鸣炮》还有一点值得关注，胡德平所追求的自由不仅是政治领域的自由，而更多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他写道：“目前，我国农民取得的劳动自由和工人阶级将取得的又一次劳动自由，既有它的客观性，又有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³⁰ 他讨论自由化问题，竟然关注农村的经济改革和即将到来的城市经济改革。实际上，这一点又证明胡德平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讨论的乃是政治经济学，即他不把政治和经济分开讨论，反而一体化来探讨。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创刊号提出理论方向之后的后续工作。比如《青年论坛》总第4期组织三篇文章：沈大德与许苏民（即《读书》的书评者“甦民”）的《自由的命运及其他》、凯明的《关于自由问题的三则对话》、陈恒六的《为学术自由呼号》。仅从题目可以看出来，这些文章都回应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由问题的三则对话》，以两个人物的对话的形式直接讨论胡德平《为自由鸣炮》一文。在开头部分一个人物问：“胡德平同志的《为自由鸣炮》一文，你看过没有？”³¹，然后开始对话。对话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第一节“自由的‘桂冠’为何会错戴？”，主要讨论为何“自由”错误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第二节“能理直气壮地宣传自由吗？”，主要讨论改革时期中国需要宣传“自由”的必要性；第三节“怎样才算完整准确地理解自由呢？”，主要讨论今后的工作方向。其实，署名“凯明”的作者，没有信息。是否真的进行两个人的对话，也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显然补充说明胡德平《为自由鸣炮》，使得读者容易接受胡德平的观点。

29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总第1期，第18页。

30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第22页。

31 凯明：《关于自由问题的三则对话》，《青年论坛》总第4期，1985年5月，第13页。

由此可见,《青年论坛》继承《这一代》的问题意识,更明确地反思文革中的观念,寻求变革现实,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理论武器。同时,不仅在创刊号上明确提出建构理论的大方向,而且在后续期刊上不断组织有关文章,继续对读者说明他们的理论诉求,使得广大青年读者逐渐接受他们的理论。换言之,通过一系列的出版,《青年论坛》实践“思想解放”,实际解放过去的观念,扩大新的理论。

耐人寻味的是,《青年论坛》发挥了多方面的实践方式。如上所述,《青年论坛》几乎每期开头刊载《前辈寄语》。前辈学者包括:李泽厚、章开沅、董辅弼、卓炯、于光远、刘道玉、周韶华、陶军。其中最关键的是李泽厚。他不仅在创刊号上发表《前辈寄语》,而且在创刊一周年时写了祝贺文章。不言而喻,李泽厚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青年论坛》创刊时他已出版《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风靡一时。在创刊号的《前辈寄语》中,他这样写道:“我的确对好些文章的质量并不满意,题目大而论证少,分析不够而空话略多。我想如果送到别的地方,很可能要被搁置或退回。从而,这倒使我更加支持他们了。因为不管如何,这些作品表现了年轻人的好些新想法、新尝试、新思路和新问题,即使极不成熟或极为粗糙,但至少反射出要求改革以求前进的意愿。”³²可见,李泽厚虽然认为青年学者的文章不够成熟,但特别肯定青年的意愿,鼓励青年的探索。而且李泽厚还提出具体的建议:“《青年论坛》设有‘批判封建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想’的‘箭响林’专栏。这使我也很高兴。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错误理论和思想。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陈污积垢难道不要认真批判吗?”³³《青年论坛》创刊号“箭响林”专栏发表的是,署名“学迅文”的《“商贾道德卑下论”驳议》,主要论点是批判传统封建思想中谴责商家的商家道德卑下论,从而发扬商界精神。批判封建主义来主张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图显然在于当下。虽然如此,表面上用学术文笔撰写,成为一篇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针对性的文章。李泽厚是否真的赞扬这篇文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泽厚的建议和肯定,无疑对青年学者有鼓励作用。

李泽厚在创刊一周年时写文章,又鼓励青年的尝试。“我从不怀疑他们

32 李泽厚:《前辈寄语》,《青年论坛》总第1期,第4页。

33 李泽厚:《前辈寄语》,第4页。

的热情和力量，但我总担心他们文章的学术质量。我对他们强调，不要发那些只图一时痛快却经不起科学推敲的文章，免使刊物刚开头就砸锅。结果一年以来，刊物不仅没砸锅，持续办了下来，而且据说反应还不错。这说明年青人比我实在要高明得多。这个刊物的确发表了好些在别处较难看到的饶有新意、颇有胆识的文章，提出了或初步论证了好些相当尖锐和敏感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这恰恰是饱学之士、老师宿儒们所未敢容易下笔的。”³⁴ 这些文字表示李泽厚对青年的肯定，但更重要的是，《青年论坛》把李泽厚的文字刊发在杂志开头的重要部分，可见青年确实需要李泽厚的支持。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青年学者和前辈学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或许是《青年论坛》的贡献之一。

其实，谈起前辈学者的支持，与李泽厚一样重要，甚至比李泽厚更重要的是王若水和刘宾雁。王若水在《青年论坛》总第3期上发表文章《智慧的痛苦》。这篇文章从1946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回顾解放前的学生运动、文革后期被批判的经验以及文革后的感慨。重要的是，王若水文章的后面还刊发唐坤的《也为人道主义辩护——对一种批判的批判》。文章开头这样写：“两年前，若水同志撰文《为人道主义辩护》，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关注。两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结束。我们觉得有必要再为人道主义辩护，特别是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辩护。”³⁵ 王若水的人道主义论，运用马克思的原著，挑战以文革时期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理解，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显然是青年学者的榜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青年学者特别向往王若水。意味深长的是，王若水以回忆自己一生的方式回应青年学者。这篇文章首先意味着王若水对青年的支持和肯定。这一点与李泽厚的短文意义一样。但王若水文章的意义不仅如此。其次意味着王若水讲述过去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为青年的文革批判提供具体的材料。更重要的或许是第三点，即王若水给青年的理论探索带来一种历史感。如李泽厚所指出，青年的文章有时显得不够成熟，王若水或许有意提供历史感，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从而对青年的探索

34 李泽厚：《破“天下达尊”——贺〈青年论坛〉创刊周年》，《青年论坛》总第8期，1986年1月，第4-5页。

35 唐坤：《也为人道主义辩护——对一种批判的批判》，《青年论坛》总第3期，1985年3月，第70页。

提供具体的建议。

刘宾雁的作用也类似于王若水。刘宾雁也从40年代开始回顾自己的经历。刘宾雁论述的中心点更贴近《青年论坛》的方向，即他集中回顾自己对理论的兴趣。他写了40年代热爱理论书、有一段时间对理论淡漠起来、文革后重新认识理论的重要性等一系列的经验。在文章结尾，他强调当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无比丰富而生动的现实为真正的理论家提供的无穷的思维和创造的资源，是任何国家的同行都要羡慕的。我们的读者群，也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最渴望了解自己周围的现实，最热切于追求真理，最热忱地期望社会的进步并为此献身。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我一生中理论兴趣最高的时候，是现在。”³⁶由此可见，刘宾雁特别重视理论，更直接支持《青年论坛》的探索。不可忽略的是，刘宾雁也提供历史感。他回顾围绕“理论”的历史经验，为当下中国的理论探索带来历史感。刘宾雁的贡献或许在于，一方面鼓励青年学者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另一方面使得青年的理论探索在更广的历史脉络中定位。王若水和刘宾雁分别提供历史感，再加上李泽厚也赞同批判封建思想的专栏，这些前辈学者不约而同地强调历史的问题，颇意味深长。

五 “五·四”的另一种想象

《青年论坛》很少直接讨论“五·四”。虽然有意推动改革，意在“思想解放”，但重点始终放在当下的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因此很少谈及现代史。但到了1986年，即到了杂志历史的后半期，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变化首先出现在有关政治领域的文章的增加，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其次是直接讨论文革的文章，如《论一九六六年》（总第10期）、《“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座谈会》（总第11期）、《论言论自由》（总第11期、总第12期）、《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总第12期）、《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总第13期）等。其中最引起广大反响的无疑是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连载两期的长篇文章，他的意图表现在长篇评论文章的开头部分：“本文旨在论证言论自由，这一工作具有某种别致之处。

36 刘宾雁：《我第三次感到贫乏》，《青年论坛》总第7期，1985年11月，第9页。

在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时，进行这种论证恐怕是不可能，然而，在完全实现了这一自由时，论证它似乎又成为不必要。这个特点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言论自由是一个取决于当权者意志的问题。这种误解导致了对于在理论上讨论言论自由这一工作的忽视，其结果是完全窒息了言论自由这一原则的价值和活力，……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没能实现言论自由，原因就在于那里的人民对言论自由缺乏觉悟。因此，在健全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工作中，澄清言论自由的含义，阐明它的价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³⁷首先胡平暗示文革时期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根本无法讨论这个问题，1980年代的中国才是讨论言论自由的好时机。其次他强调言论自由问题有价值 and 活力，颇值得认真讨论。然后他宣称，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澄清言论自由的含义、阐明言论自由的价值和力量。其实，胡平的论述很谨慎，严格遵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反复强调言论自由绝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文章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总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讨论，而且始终探讨理论问题，没有混淆现实问题。但即便如此，他的用意很明显，让改革不限于经济领域上，更推向政治领域上。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势，胡平的论述无疑很激进、很有突破性。胡平的文章引起很多方面的反响。《青年论坛》总13期刊载《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整理北京的青年读者的回应。

就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论坛》开始刊登探讨现代史的文章。具体而言，80年代中国流行的“中国文化热”、“中西文化比较”引发了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关注。1986年《青年论坛》总第9期刊载甘阳的文章《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据编者按，对于80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在文本作者看来，这种文化讨论实际上是百年以来‘中西古今文化之争’的继续；这个百年未决的历史大课题在八十年代能否有个最终的了断，作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似可肯定，时下许多论者的种种‘新鲜’说法，大抵不过是‘老调子又重新唱起来了’而已。”³⁸甘阳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的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基本态度是对中国文化自尊论的否定，极力主张走向现代化的路程。他强调：“因此，问题的实质就根本不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而是在于，中国

37 胡平：《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总第11期，1986年7月，第105页。

38 甘阳：《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青年论坛》总第9期，1986年3月，第69页。

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³⁹ 甘阳的观点基本顺从五·四启蒙思想，而且配合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想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以《青年论坛》为中心的青年群体的集体意识，也表现 1986 年《青年论坛》超越经济改革走向多方面改革的整体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较不仅导致甘阳等人的观点，也可能动摇有关“五·四”文化的单一化想象。《青年论坛》总第 12 期刊载的郭齐勇《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评介》一文，用了研究介绍的方式，讲到稍微不同于甘阳的观点。这篇文章详细介绍 80 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基本情况、各个说法的主要观点以及现实意义。郭齐勇特别注意：“在多元的文化传统中，我们应当重视的不是元明清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宋明理学，而恰恰是十七世纪兴起的反对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即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徐光启、梅文鼎、傅山、唐甄等为代表的早期民主主义传统和‘核物究理’‘经世致用’的科学传统。”⁴⁰ 他把清代的学术定位于“早期启蒙思潮”，这种想法是否合适，本文不去细说，重要的是，郭齐勇居然在传统文化中发现启蒙的根源。因此，对“五·四”也有不同的想法。他接着写道：“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不难看出宋明理学传统惰力、封建意识的深厚积淀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复旧作用，已成为现代化的实际阻力。”⁴¹ 郭齐勇其实完全没有否定现代化的路程，也完全没有脱离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的基本路线，而且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反对宋明儒学。只是，他发现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另外一种传统文化思潮，认定这种传统文化思潮为早期启蒙思潮，从而把“五·四”的意义局限于反对宋明理学的一点，实际上开拓有别于“五·四”-马克思主义一条线之外的另外一种“五·四”想象。他是否有意识地反抗官方历史意识，我们不得而知。他的灵感来源，我们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 80 年代青年学者大规模地进行理论探索、检讨传统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大环境中，居然出现对“五·四”的另外想象。

39 甘阳：《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第 79 页。

40 郭齐勇：《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评介》，《青年论坛》总第 12 期，1986 年 9 月，第 38-39 页。

41 郭齐勇：《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评介》，第 39 页。

《青年论坛》刊载对“五·四”稍微不同于以往的想法，实际动摇了“五·四”的固定化理解，引出更丰富多彩的“五·四”想象。《青年论坛》总第13期发表黄克剑的《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选择——评胡适廿至卅年代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几篇文章》，比较全面介绍胡适的观点。不言而喻，胡适在新中国是学术上的禁区，黄克剑早在80年代中期打破禁区，研究胡适的思想，颇有胆量。⁴²由此可见，《青年论坛》建立了能够打破禁区的学术平台，产生多样的“五·四”想象。

让人可惜的是，刊发黄克剑文章的《青年论坛》总第13期是现在留下的最后一期，其后没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讨论。更让人可惜的是，“五·四”的另一种想象和有关胡适的研究，没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多方面发展，也无法与政治改革话题联系。一定程度上，《青年论坛》的政治改革讨论为现代史的讨论创造环境，使得出现另外一种“五·四”想象和胡适研究。但恰恰因为与政治改革几乎同时出现，现代史的探索也无缘深化。我们知道胡适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是在2000年前后中国讨论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但如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深化有关胡适的研究，或许能讨论出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有助于中国改革的胡适研究。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学者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实意识，寻求变革现实、推动改革，大胆地挑战各种课题，实际开拓新的问题。他们从文革时期的切身感受出发，进行理论探索，逐步推进，谈到另外一种“五·四”想象。但很遗憾，没有做到令人满意的地步之前，不得不停步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五·四”的命运之一。⁴³

42 首次报告小文时，讲评人宋声泉副教授提醒易竹贤教授早在1980年前后已在武汉大学讲授重评胡适的课程，黄克剑的文章或有关联，但具体情况尚待查证。

43 本文得到了JSPS科研费JP17H02324的资助，特致感谢。